

# 就业率垫底折射地方院校发展困局

■本报见习记者 韩琨

日前,《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称,教育部对2012年毕业生就业率统计排名的结果是,第一“985工程”高校,第二高职院校,第三“211工程”大学,第四独立学院,第五科研院所,第六地方普通高校。

在“就业最难年”的大背景下,这一教育部对于毕业生就业率排名的新闻也就格外引人关注。

在统计中就业率“垫底”的院校,并非教育部等国家一级的部门直属,而是省市级直属的地方本科院校。据统计,至2012年我国共有本科高等学校1147所,其中1999年以来专升本的有640多所。就数量和学生人数而言,地方本科院校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的主体。

因此,人们不禁要问,这类学校缘何垫底,又该如何面对困难、谋求发展呢?

## 所谓“就业率”垫底

被问及这条地方院校垫底就业率的新闻时,福建省某省属高校学生就业指导中心的工作人员小甘的第一反应是“这个数据挺有意思的,但对于所谓就业率,需要澄清一下”。

小甘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解释道,按照教育部目前实行的就业率统计方法,计入就业的情况有多种,具体包括:签订三方协议就业,无需签三方的劳动合同,自主创业、自由职业,升学、出国、出境留学、工作等等。因此,在这些所谓的已就业的毕业生中,真正开始工作的比例远小于就业率的数字。

由于就业率成了高校每年必须提交的数字“政绩”,一些高校为了保证就业率甚至以扣押学生毕业证的方式强制学生提供就业协议,这样的新闻近些年时常见诸报端。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就业率是高校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尽管存在“注水”和造假的情况,但是各院校都在这同一个体系和指标下衡量,因此,就业率统计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客观性。

与此同时,小甘提醒记者道:“我们学校间互相比学生就业情况的时候,更在意签约率。”而所谓签约率,则是排除了升学、出国深造等情况之外,毕业生们更为真实的工作比率。同为地方院校,地方本科院校在就业率统计中低于高职院校。小甘对这一统计结果的回答是,的确如此。但他仍然有话要说,“比起就业率这个数字,学校还应该关心毕业生的就业质量。”

由于在就业指导中心工作,小甘认识了不少地方公司的招聘主管。曾有位主管告诉他,公司去邻市的高职院校招聘时发现,高职的毕业生们往往更青睐去工厂而非公司就业。换言之,高职的毕业生大多从事的工作与一些只有小学、初中文化的进城务工人员类似,实际是在“打工”。在小甘看来,如果是这样的就业质量,即使就业率高一一些,也并不值得欣喜。

## 功利化办学

除了这次就业率垫底之外,地方院校被社会热议之处还有“考研基地”。近些年来,许多地方院校的学生入学后就准备考研,山西大学“考研基地”的标签,实际上就等同于高中的应试生活。而那些不

“

就业率是高校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尽管存在“注水”和造假的情况,但各院校都在这同一个体系和指标下衡量,因此,就业率统计仍有其意义。

大多数地方本科院校应定位于应用型,其主要任务是面向地方服务,培养大批应用型专门人才。

管其他功课,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准备考研的学生特别多的学校,就成了人们口中的“考研基地”。

虽然小甘所在的学校并不算是“考研基地”,只有一些读比较冷门的基础学科的学生会考研,但他对“考研基地”的这些“考研专业户”们表示理解。

“读了不算理想的学校,工作并不好找,学生把希望都寄托在考研上,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努力来改变前途,也无可指责。”小甘说。

在这些考研基地,学生一进校,学校就把考研作为头等大事。曾有媒体报道,新生入学典礼上,校长便告诉他们,接下来改变命运的机会,就是考上研究生。甚至学校的课程设计、教育教学安排都为考研让路。

对此,熊丙奇认为,这是一种功利化办学的表现。不可能每个人都考取研究生,考研失败的学生,转而找工作会变得困难重重:一来招聘季已经过去;二来,他们在大学阶段没有接受多少真正的大学教育,缺乏就业竞争力。就业率低,也与此有关。

在熊丙奇看来,“地方本科院校的功利办学,还表现在刚刚专升本,就想着举办硕士点、博士点,认为这样可以快速提高学校的办学层次。这也能得到地方政府部门的支持。”

事实上,当初众多专科学校要升格成为本科院校,也是出于功利的考量,而非办学的考量。据熊丙奇介绍,升格为本科后,学校领导的行政级别可以从副厅提升为正厅;学校的校名可以从学校更名为学院甚至“更好听”的大学;学校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增加招生规模



图片来源:www.quanjing.com

和体量等等。

## 先天不足,找补失当

学校发展困难,最现实和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两个字:缺钱。

在资金支持方面,地方院校可谓“先天不足”。在中国现有的教育体系下,地方院校的“地方”属性决定了其资金来源于地方政府。而部分省级政府为做强地方高等教育,大力支持省属高校依靠自身特色积极争取相关中央部委的资金和资源支持,因此,广义的地方院校包括省属国家“211工程”重点大学、省部共建大学、地方性直属高校三大类。但前两者毕竟是少数,在2500多所地方院校中,大多数都是仅靠地方财政拨款支持。

据了解,高校经费的主要来源是生均拨款和专项经费。部属院校生均拨款是1.2万元,有的甚至达2万元;而地方院校直到去年才涨到1.2万元,以前一直是5000元左右,两者有2-3倍的巨大差距。

并且,同样是省属的地方院校,由于所在“地方”的不同,学校得到的财政支持也不同。以福建省为例,小甘介绍道,省里的拨款一般都集中给予省会福州的几所高校,如福州大学、福州师范大学等,而省内其他城市,即使是经济较发达的厦门市的高校,从省里得到的拨款相对较少。

然而在学生眼里,学校有没有钱,最直观的感受来自学校奖学金的丰厚程度。记者了解到若干不同高校的情况,“985工程”院校的一等奖学

金一般是5000元,二等奖2000元,三等奖1000元。在上海某市属高校,三等奖学金是100元,一等奖奖学金也不过1000元。

因此,不断扩张,增设学科,想要争取硕士点、博士点,提升学校的名气,这些都是地方院校获得更多资源的争取手段。在我国现行教育行政体系下,学校的行政级别上去了、名气上去了,才有可能发展得好。“其实我们也理解这种做法。学校名气大,老师和学生走出去也都觉得更有面子。”上海某市属高校的辅导员朱许说。

然而,如此的扩张式发展,盲目增加学科和专业,在熊丙奇看来,导致学校本来就不雄厚的办学资源被稀释,而在申办硕士点的过程中,学校的特色也荡然无存。

毕竟,对研究型大学而言,都要在“高、大、全”的同时注重特色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实力本就不足的地方本科院校想把自己提升成为又一个研究型大学,发展目标已然选择失当。

## 培养应用型人才,回归本位

那么,地方本科院校的定位应该是什么呢?在时常举办的地方本科院校发展论坛上,探讨这一问题时,包括这些学校的领导在内,几乎所有学者专家都一致认为,要培养应用型人才,就要突出地方特色。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潘懋元等人对此有更为精准的表达。他们经过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根据我国地方本科院校的办学历史、办学规模、办学类型、办学布局、办学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大多数地方本科院校应定位于应用型,其主要任务是面向地方服务,培养大批应用型专门人才。”

强调应用型人才培养,那么这种定位是否与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重合呢?潘懋元认为,并不会重合。地方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既有别于传统本科院校培养的学术型人才,又有别于高职高专院校培养的技能型人才。

在潘懋元看来,地方本科院校应走出传统的精英教育办学理念 and 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开展应用性教育,培养面向地方、服务基层的本科层次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地方本科院校不过分要求知识的深厚,而是着重要求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最佳结合。熊丙奇解释道,“应用型创新人才应是受过本科教育的应用性人才,区别于高职院校的技术人才”。

服务地方,发展特色,小甘所在学校的航海专业可以说是突出特色发展的典范。作为国内四大航海强校之一,每年招聘季最早定下来工作的就是航海学院的学生,基本上在每年10月就可以签约。对比“冷门”专业学生埋头复习考研的情况,小甘认为,这说明许多学生考研是无奈的选择,这也刚好印证了发展优势和特色专业的正确性。

在地方本科院校的发展困局中,一向倡导要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熊丙奇认为,地方政府部门和高校应该进行深入反思。除却回归定位外,更为关键的是,要理顺地方政府和学校的关系。地方政府应该保障对学校的投入,但同时把办学自主权交给学校;而对于学校来说,则需要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不应追求功利。

“这不是地方院校的改革,而是回归本位。”熊丙奇说。

# 大学生创业呼唤公益生态环境

■本报记者 温才妃

一股公益创业之风,近年来吹向我国高校。它不同于商业创业专注于经济利益,而是将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创造性地融合起来。

在近日举行的第三届“青年恒好”活动中期成果发布会上,公益创业的理念得到了大学生们的积极响应。山西大学“爱服务”志愿服务队关爱孤寡老人,提出了“以公益为主,盈利为辅”的创业模式;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编委编织吧出售具有少数民族风情的工艺品,他们所得的利润将全部用于公益捐款。

据KAB全国推广办公室总干事张坤介绍,“青年恒好”活动由KAB(Know about business,国际劳工组织为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而专门开发的教育项目)与恒源祥(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搭建,旨在教授KAB课程的基础上,推动各高校开展创业教育课外实践活动,为有志于创业的大学生提供“练兵场”。

那么,透过此次活动,如今高校中的公益创业出现了什么新趋势?又遇到了怎样难解的问题呢?

## 公益创业的范围越来越宽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社区中的弱势群体格外需要社会关注和专业服务,我们希望通过引入社工,提供全新的公益服务方式,为实现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台上,山西大学KAB创业俱乐部的主席刘华民激动地说。他和团队成员曾多次深入敬老院和自闭症儿童机构开展调研、志愿服务等活动。

据恒源祥公司党委副书记顾红蕾介绍,截至2013年6月底,主办方共收到来自兰州大学、北

京邮电大学、四川美术学院等近百所高校,近200份个人创业计划书,其中包括服务社区孤寡老人、关爱自闭症儿童、爱鸟护鸟、深入大山、义务支教等多种公益创业形式。

“无论从社会调研的深度、广度,公益创业模式的创新性、可操作性,相对于上届活动都取得了大幅提升。”顾红蕾说。

KAB创业教育(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家华补充道,大学生公益创业关注的范围越来越宽泛。“过去多关注弱势群体、残疾人,现在还考虑到健全者,健全的生命在面对空气污染时也是弱势群体。”

感受到全社会对于公益创业的需要,让大学生了解一个品牌创业过程中的社会责任,是恒源祥连续三年支持“青年恒好”活动的重要原因。顾红蕾表示,用创业、商业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构建一个服务扶持大学生创业的公益性开放平台,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 公益创业的生态环境缺失

尽管公益创业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认同并接受,但放眼国内,公益创业的氛围仍然相对薄弱。

以公益创业课程为例,李家华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由于我国的社会公益整体处于初级阶段,尚有大量不规范之处,导致相应的公益课程、公益创业课程开发并不成熟。

“尤其是课程的本土化特别困难。”李家华解释,中西方总的价值判断虽然大致相同,但在行事习惯上有诸多不同之处,对西方课程实行“拿来主义”并不见得行得通。

同时,国内公益创业课程的本土化开发也相对缺乏。记者了解到,将国外公益创业的课程引入国内课堂只有短短三四年时间,最早还是由职业院校关注并引入的。高校中开设公益创业课程的微乎其微,发展较好的仅有湖南大学中国公益创业研究中心等少数几家。

事实上,对于公益创业的忽视,不只是发生在高校校园,社会对这一理念的认知也仅停留在少数学者、社会组织层面,不少官员、政府组织的理解中仍是将挣钱与公益二者对立起来。

李家华表示,公益创业要找到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价值增长点。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对环境的保护,不能仅仅依靠他人捐款,因为这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而必须寻找一种商业模式,获得资金,转投到社会价值中去,从而实现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可持续增长。

“下一步需要重点关注的,一方面是公益创业课程的本土化,另一方面是课程能否与公益事业、与市场对接起来。”李家华说,“之前提出的是商业创业的生态环境,接下来,我们要考虑更高层次的生态环境——公益创业的生态环境。”

## 重视创新,让每一棵小草都有生长的机会

究竟要如何创建公益创业的生态环境呢?李家华指出,公益创业的生态环境需要技术支持和实践支持。

他表示,创业光有热情、精神是不够的,需要有一个科学的方法。所谓的技术支持就是要搞清公益创业生态环境发展的内涵是什么。“下一步要花大力气进行中国创业生态环境的研究,需

要有国家层面的课题,鼓励更多学者、专家研究,然后根据生态环境的内涵和架构,给国家出台相应政策作扶持,给学校的教学体系、人才培养作支撑。”

同时,创业是实践性很强的活动,支持生态环境的资金来源,不仅需要国家的投资,还需要社会组织、企业的参与和捐助。那么,企业在其中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顾红蕾表示,在整个活动中,企业一方面致力于满足大学生创业的需求,特别是在运营项目、品牌建设过程中,将多年积累的经验传授给大学生;另一方面,提供创业的资金支持,“更重要的是后期的持续投入,包括创业项目在落地过程中匹配的资源”。譬如,将企业在当地的经销商,配备给大学生创业团队作创业导师。

“事实上,创业的本质是创新,公益创业应该得到更多的社会理解和支持。”李家华说,“人们固然愿意买一个高质量的产品,但能否买一个代表先进理念但却不很成熟的产品?能否搞一个大学创业产品的超市,展示后者?它虽然不满足大众,但却在小众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包容的生态环境,自然可以吸引很多大学生参与其中。”

难就难在,如今人们被大量成熟企业包裹,却忽略了作为创新先锋的小企业——一旦有新产品、新技术在小企业诞生,处于垄断地位的国企、大企业迅速买断版权,使得新产品在市场上无法得到正常的检验。“改变这种环境,需要从国家、市场层面帮助建立良性的生态环境,让每一棵小草都有生长的机会。”李家华说。

## 中国大学评论

# 应关注远程教育公平的公平问题

■李锋亮

近两年来,大学公开课、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简称MOOCs)成为世界范围内学者、政治家、商业精英以及社会民众共同热烈讨论的话题。很多人认为这可能揭示着远程高等教育新纪元的到来。目前对于大学公开课、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的讨论主要聚焦于其对传统面授高等教育、传统大学的冲击,但是很少有人去讨论这些开放课程可能对教育公平产生的影响。然而,在笔者看来,非常有必要关注这次远程教育的发展浪潮可能带来的教育公平问题,尤其是关注那些弱势群体是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还是和强势群体的受教育机会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关心远程教育的读者应该知道,远程教育在产生之初就致力于促进教育公平,特别是希望能够给偏远、贫穷的农村地区的人群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很多政府组织以及国际组织,也认为远程教育要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机会,认为远程教育要致力于帮助弱势群体走出社会困境、为他们提供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因此从上个世纪以来,很多国家与地区都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远程教育。

尽管提供远程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教育公平,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很多学者与民众在讨论教育公平时,却都是关注于传统的面授教育,而忽视了远程教育的公平问题。最近笔者以及其他研究者一起专门分析了我国远程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地区间的不公平问题。

然而,讨论结果却让人有些失望。我们通过计算2003-2008年我国除网远远程教育外,传统面授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的基尼系数,发现随着我国整个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展,在提升地区间的高等教育机会公平方面,远程教育等教育做的还不如传统面授高等教育那么好。更令人担忧的是,在西部地区也就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远程高等教育的地区不公平现象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因此,虽然远程教育具有跨越时空、跨越学校围墙、教室的优势,使得弱势群体、偏远地区的学习者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得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与更好的教育资源;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与资助政策,很有可能弱势群体、欠发达地区的群体反而会陷入“数字化鸿沟”不能自拔,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这显然不是远程教育的政策制订者以及广大民众希望看到的事实。

目前MOOCs在全球方兴未艾,尽管MOOCs的课程是免费的,但是很多商业机构已经对此跃跃欲试,期望从中找到巨大的获利商机。国际上著名的远程教育专家约翰·丹尼尔爵士(Sir John Daniel)在一个学术演讲中列举了MOOCs八种可能的商业盈利模式,其中最少的有三种盈利模式都是专门针对学习者收费的,包括:学习者虽然不要为课程学习付费,但要为毕业证书付费;学习者虽然接受在线课程是免费的,但是要为课程辅导或者作业批改付费;学习者甚至要为课程学习本身付费,比如要为教材付费等。

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弱势群体在免费的大规模在线课程面前,首先要掂量一下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财力能够为课程学习的不同环节付费,或者是否为之付费是否划算。这就会带来教育公平的问题。除此之外,弱势群体在接受在线学习时还可能遇到一系列其他问题(比如初始学习能力的欠缺),这些问题都有可能让弱势群体在MOOCs面前止步。

鉴于此,非常有必要未雨绸缪地对MOOCs可能会给教育公平带来的影响进行相应的研究与评估。根据研究与评估结果,相关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以及提供远程教育、开放在线课程的办学机构,就应该针对弱势群体制订相应的资助政策与教学方法,比如在学习过程中如何给予弱势群体在学费(比如上述所提及的三种盈利模式中)学习可能需要为学习支付的相关费用)、上网条件与费用、在线学习方法的掌握、克服在线学习的心理障碍等方面给予支持,以免弱势群体无法跨越在线学习的财政以及初始学习能力的门槛。

总之,不管是MOOCs还是对于整个远程教育而言,政府、学者以及整个社会都应该对其相关的教育公平问题给予广泛而且深入的关注,以免让一个本来能够有效促进教育公平的教育子系统反倒成为一个扩大教育不公平的“帮凶”。